

宋昌中 著

老舍全集

吉林大学出版社

库 普 林

宋昌中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库 著 林

宋昌中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东中华路29号) 长春市粮食系统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1990年11月第1版

印张: 4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87千字 印数: 1—300册

ISBN 7-5601-0671-4 /I·34 定价: 0.95元

目 录

生平与创作	(1)
莫斯科的孤儿(1870—1880).....	(2)
从军事学校学员到少尉军官 (1880—1894)	(3)
“我是一个流浪汉！”(1894—1901).....	(11)
“这是我和沙皇军队之间的决斗” (1902—1906)	(23)
十月革命前后的库普林(1907—1920).....	(39)
流亡巴黎的侨民(1920—1937).....	(58)
主要代表作品简介	(67)
《莫洛赫》	(67)
《阿列霞》	(76)
《决 斗》	(90)
《石榴石手镯》	(104)
艺术特色	(113)

生 平 与 创 作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库普林(1870—1938)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他生活在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第三个阶段——无产阶级领导千百万人民群众，反对沙皇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时代。9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1905年革命，革命失败后的反动统治、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等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他和他的创作都起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动荡的时代和作家复杂的世界观决定了他一生坎坷的命运。这个出身贫寒的青年军官、南俄报刊的记者，在20世纪初的俄国文坛上享有盛名，但是他并不理解无产阶级革命和科学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达17年之久，直到去世前1年才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苏联。

库普林写过诗歌、童话、小品文、小说等体裁的作品，其中以短篇和中篇小说最为有名。他的小说《莫洛赫》、《阿列霞》、《石榴石手镯》和《决斗》等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并一再被搬上银幕，风靡一时。作家的小说无情地揭露了俄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脓疮，热情赞美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细腻地刻划出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普通人的内心世界。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高尔基都很重视他的文学天才。托尔斯泰曾不止一次地称赞过他，有一次给家人朗诵库普林的短篇小说《冲呀！》，甚至黯然神伤，不忍卒读，中断了朗诵。作为一个具有托尔斯泰气质的作家，库普林同时也受到

过契诃夫和高尔基的影响。契诃夫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简洁精炼的风格；高尔基的关于人生使命在于改造现实的思想，都在库普林创作中留下深刻的痕迹。在这些严师益友的帮助下，库普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细致的人物心理描写，广泛反映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活。从城市到乡村，从资本家、地主、知识分子直至工人、农民、演员、妓女、盗贼等人的生活在他的作品中都得到反映，因此人们称他为俄国“生活的诗人”。

莫斯科的孤儿（1870—1880）

库普林于1870年9月7日（俄历8月26日），出生在奔萨省诺罗夫恰特市的平民家庭。他的父亲当过法院的收发员和医院的办事员，1869年退职时是十四等文官，这是俄国最低级的公务员。他母亲出身于破落的“贵族之家”。他的祖先库龙恰克是15世纪归化莫斯科王国的鞑靼贵族。17世纪她的曾祖父在诺罗夫恰特市获得领地，后因沉缅酒色，挥霍无度，家道日衰。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这个家族已沦为城市贫民。

1871年秋，库普林的父亲患霍乱病突然去世，留下刚满周岁的库普林和他的两个姐姐，最大的姐姐当时才10岁。全家生计无着，处境十分困难。库普林的母亲是受过教育的“鞑靼郡主”，处事精明能干，为人颇有心计，为了培养子女成人，托人求情将两个女儿送进免费的寄宿学校念书。她自己则领着萨夏（库普林的名字亚历山大的爱称）设法住进了莫斯科的孀妇院。这是一个救济孤儿寡妇的慈善机关，住

房拥挤，饭食粗劣，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仅仅免于流落街头罢了。萨夏从懂事起就生活在孀妇院老太婆们的窃窃私议、闲言碎语的环境里。他看到母亲在权贵面前奴颜婢膝，乞求赏赐的样子，心理很不是滋味，自认低人一等，逐渐养成一种腼腆、拘谨和多疑的性格。有时他以父亲是平民出身而自豪，平易近人，温顺谦和；有时则念念不忘自己是鞑靼贵胄的后代，身上流着“半野蛮的亚洲人”的血液，孤傲狷介，刚愎自用。他的自尊心极重、容易激动、爱好幻想、对人温柔真诚而又偏执古怪。这种性格与他的家庭出身和童年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后来他在《勇敢的逃亡者》（1917）、《神圣的谎言》（1914）、《退休》（1902）等作品中揭露了慈善机构的黑暗内幕，详尽地诉说了寄人篱下的屈辱生活，为俄国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主题。

萨夏6岁那年被母亲送进亚历山大孤儿小学读书，4年后考入莫斯科第二武备中学（该校不久改名为武备中学），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的军人生活。他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几乎与社会隔绝的军事学校和兵营中度过的。

从军事学校学员到少尉军官 (1880—1894)

19世纪80年代是俄国历史上最反动、最黑暗的时期。1881年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实行公开的恐怖统治，查封学校和进步刊物《祖国纪事》，残酷镇压自由思想，宣扬大俄罗斯主义，大力提倡军事教育。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0岁的萨夏进入军事学校，

当时这是穷苦人的孩子唯一能受到教育的地方。

萨夏现在穿上有8颗铜扣的黑呢子制服，佩带蓝色的肩章和红色的领章，除了没有束腰带外，俨然是个小军人了。但是武备中学的生活并不比孀妇院或孤儿小学好多少。他在中篇小说《大转变（武备中学学生）》（1900）写道：这座武备中学简直是一个横暴愚昧的“胡作非为共和国”，“拳头至上是公认的信条，整个学校分成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种代代相传的陈规陋习在幼小的学生中间表现得尤其明显”。中篇小说主人公布拉文的原型就是作者自己。

全校同学中打架成风，有公认的霸王，每个班级有数名“种子”打手，按“比武”中的输赢编排名次。比如第15号种子打败了第10号种子，那末双方都要轮流与11号至14号种子比武，以便重新调整名次的排列。这种比武一般在厕所举行，双方决不留情，直到一人将对方打出血来并倒地方休。学校以此培养“军人的尚武精神”。低年级同学须定期将家里带来的食品孝敬大、小霸王，否则就被打得鼻青脸肿。布拉文入学第一天就挨了揍，漂亮的铜扣子被人扯掉，但是脸上还要装出笑容，直到夜里才敢在被窝里低声地哭泣。任课的教员不学无术，酗酒成风。历史教师在讲彼得大帝的武功时，不时掏出一个“药瓶”喝上几口，教室里酒香四溢。俄文教师经常扒在讲台上打呼噜，难得几回清醒，于是教室里成了霸王们搞小动作的天下。教员们经常对学生实行各种各样的体罚：揪耳朵、用马刺踢、搜身等侮辱人格的处分更是家常便饭。有一件事使得布拉文终生难忘，一个绰号叫“狼”的同学做了个玩具，以3个卢布的价钱赊给了布拉文。布拉文在上课时偷偷地玩这东西，被老师没收了，后来他发现这心爱的玩具居然被老师据为己有，给他家里的女儿玩了。

布拉文不敢向母亲要三个卢布还债，为此只好天天给“狼”擦皮鞋，把每天学校发的白面包给他吃，自己一天只喝一盘汤和两个黑面包。从此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闷闷不乐，无心学习。一个礼拜日，他又因学习不好被罚不得回家，留在学校里与另一个同学玩耍，无意中碰撞了值日教员克金一下，于是他以“侮辱师长”的罪名被关禁闭。4天后，校长在全体师生面前宣布给他以鞭打10下的处分。“‘学徒布拉文，出列！’校长命令道。布拉文从队伍中走出来，就某种意义上说，他体验到了一个犯人即将被处决时的全部感受。他被人押走了，心里甚至没有想逃走或反抗的念头，更没有幻想过天使搭救他的奇迹会出现”。他被带到寝室，躺在一条长凳上，两个士兵扒下他的长裤，然后一人坐在他的脚上，另一个人骑在他的头上，他在大兵裤子的臭气中挨了鞭子。“过了许多年后，布拉文的心灵创口还在不断地渗血，始终难以愈合。唉，算了吧，该愈合了吧？”

这部小说在20世纪初问世后，曾受到军方的严厉指责，那个当年告发过他的教员克金曾向库普林提出抗议。库普林一直保存着这封“抗议信”，作为沙皇当局摧残儿童、实行军国主义教育的见证。直到晚年，他还在《亲爱的莫斯科》一文中写道：“布拉文就是我自己，在武备中学惨遭毒打一事使我终生难忘。”

1888年库普林在武备中学毕业，文凭上写的评语是：“该生行为良好，顺利地读完武备中学的全部课程”。同年秋天，他被保送到莫斯科有名的亚历山大洛夫士官学校深造。两年的士官生生活在他的思想上留下深刻的烙印。这是一座培养效忠沙皇的军官学校，士官生有“沙皇军队之花”的称呼，白色的肩章上镶有红字“A·II”·II（亚历山大二世的缩写）。

库普林入学不久就参加了士官生组成的部队，在克里姆林宫接受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检阅。这个18岁的青年站在队列中看到沙皇、皇后和皇储等从队伍前经过，心中如痴如狂，默默地叨念道：“这是多么美好、神圣和终生难忘的时刻！”

库普林已经不再是那个身材矮小、懦弱爱哭，动作笨拙的武备中学学生萨夏了，他长得一表人才，体格强壮、胸肌发达、灵活机敏、酷爱跳舞，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士官生了。与此同时，外祖父家鞑靼王公们的血液在他身上沸腾着，使他做出一些莽撞的事情来。

在一次圣诞节的舞会上，他爱上一位教授的女儿齐娜，可是不敢冒昧地直接写信向他求爱，怕她的父亲见了信生气，于是他想出一个主意：用无色的柠檬汁写好一封热情洋溢的情书，等信纸干后，再用墨水以奥列姨妈的名义写了一些家常话，信中每一行的第一个字母连起来就是“烘乾”的意思。信封上贴着外埠邮票。第二天齐娜收到信后，怎么也想不起这个“奥利姨妈”来，以为是邮差把信送错了。后来还是她的父亲看出门道，老教授眉开眼笑地说：“你不记得奥列姨妈？就是那位身材匀称的小伙子，嘴上留有一撮小胡子的跳舞爱好者呀！快拿去烘干，好好念念吧。”

库普林的学习成绩不差，但他对军事课程一直不感兴趣，很想弃武习文，当一个诗人或小说家。还在小学时，他试写过“小鸟，小鸟，快快飞！”的短诗，每当家里来了客人，母亲总是叫他朗诵这首诗，客人因此夸奖他是“未来的普希金”。现存有他在1883——1887年间写的近30首抒情诗，内容包括爱情诗、讽刺诗和公民诗等，其中有一首名叫《梦幻》的公民诗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倾向，值得注意。

1887年5月8日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等5民名粹派分子因图谋刺杀沙皇被处以绞刑，库普林在他们被处决前几天写了这首诗，谴责政府当局杀害革命青年的罪行。他在诗中写道：

整个广场突然鸦雀无声，令人不寒而栗……
传来一个孩子断断续续的哭声，
接着又是一片沉默。只见那个准备行刑的刽子手
大步走上绞刑台。
一辆大车驶近了。人群中默默地让出道来，
兽性的好奇变成了怯懦的恐惧。
我看见绞索落在某个人的头上，
我看见他脚下的木凳在摇晃。
我看见：他们睁大两眼，
我看见临死前可怕的痛苦表情，
从远处传来一声呻吟……
一场骇人听闻的丑剧结束了……”

这首诗表明士官生库普林不满政府血腥镇压，关心社会和国家的命运，当然也谈不上有什么明确的政治信念。他在学校和家中甚至没有听说过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名字，只是怀着人道主义的观点同情民粹派罢了。

1887年库普林试译过德国著名诗人海涅的长诗《洛列莱》。他借助德俄词典逐字逐句地翻译，译成后多次修改润色，结果还是没有译好。德文老师告诉他：“译者心中应该具有诗人的灵魂。”

库普林这时读了普希金等诗人的诗歌，自知缺乏写诗的天才，不是“未来的普希金”，于是他转而致力于散文写作。他在课堂上写的作文深得老师的赞扬，经常得到满分的成绩。他幻想一举成名，写了一部关于美洲印第安人反抗白

人殖民者的长篇小说，密密麻麻地共写了5本练习簿，但是这部“巨著”送到出版商那里后一直没有下文。

皇天不负有心人，库普林经过多次失败后终于取得初步的成功，1889年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最新的处女作》在一家杂志上发表了。那是一个星期日，士官生库普林因“筑城工事”一科考试不及格被勒令留校不得外出。当同伴取来那本刊登他的作品的杂志时，他高兴地在寝室的各个床位上跳来跳去，一再向人念自己的“大作”。但是他高兴得太早了！次日早晨集合时，连长以库普林违反军纪，擅自发表文章为名下令将他“关禁闭三天”，把刊登他那篇小说的杂志“扔进厕所”。库普林以怀才不遇的受难者自比，悻悻然地进了禁闭室。为了消磨时光，他翻阅几本同学送来的书籍，其中一本是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哥萨克》。库普林很快地被这部小说吸引住了，从黄昏开始一口气读到次日早晨，沉醉在托尔斯泰笔下高加索的人物和自然景色描写之中，对托尔斯泰的艺术风格钦佩得五体投地。他想：莎士比亚、歌德、拜伦、荷马、普希金、塞万提斯、但丁，这些大作家都是旷世奇才、天之骄子。他自己虽不大理解这些大师，然而崇拜他们。但是，托尔斯泰是怎么回事呢？多年后库普林写道：

“这是一个具有伯爵称号的纯朴的普通人，跟我们一样，有一双手、两隻脚、一对眼睛、两隻耳朵和一个鼻子，像我们大家一样地吃喝、呼吸、揩鼻涕和睡觉……突然他用最普通的字眼，不费吹灰之力，丝毫没有斧凿痕迹地开始娓娓地讲述了自己的见闻，写出了他这部无与伦比的优美而又朴质无华的中篇小说。”库普林认识到自己的处女作“苍白无力，完全没有生活真实”，缺乏生活的根据。两天后，他被释放时，连长问他：“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关押？”库普林答

道：“我明白，因为我写了一篇世界上最粗俗低级的作品。”连长听后大为惊讶，因为按照军事条例规定，军事院校的学员未经许可是不能擅自往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最新的处女作》的确是不成熟的作品，但是它的发表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场风波对库普林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他重新检讨了自己，开阔了眼界，开始向托尔斯泰学习，走上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1914年俄国文学界人士庆祝库普林从事文学创作25周年时，一致认为这篇处女作的发表是他创作生涯中的一件大事。

关于亚历山大洛夫士官学校的生活，后来在国外库普林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士官生们》（1933年），作为《大转变（武备中学学生）》的续篇。长篇小说以感伤怀旧的情调，美化士官生的生活，这和以揭露为主的《大转变（武备中学学生）》不同，反映出作者寄身异国，不堪回首话当年的心境，但是据考证，这部自传体小说同样具有“文献的准确性。”

1890年8月库普林以优等成绩在亚历山大洛夫士官学校毕业，被分配到第46第聂伯步兵团任少尉军官。该团在与奥匈帝国接壤的波多利斯克省驻防，团部设在普洛斯库洛夫县。这是一个典型的俄国西南边境县城，犹太人和波兰人占当地居民的大多数，“一年到头的泥泞，街上成群的猪，外面涂着粘土和畜粪的茅舍”。团所属的四个营轮流到边境线上一些“地图上难以找到”的村镇驻防。军官们从不看书报，不关心时事，在一起谈论的话题离不了升官晋职和女人。从早到晚是千遍一律的操练，上酒馆喝伏特加，到军官俱乐部跳舞，与团里的太太小姐们调情。库普林初来时很不习惯这种沉闷无聊，与世隔绝的生活，很想回莫斯科去。几个月过去了，这个20岁的少尉军官也学会了打牌、喝

酒和调情，在执行军官的职责上，他虽然不大热心，但一般也能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与那些打骂成性、以折磨士兵为乐的同事不同，库普林从不殴打士兵或污辱他们的人格。他在少年时代亲身体验过“胡作非为共和国”的滋味，认为必须把一切人当作人来看待，不论这个人是小兵还是将军。正如在武备中学时写诗那样，库普林经常把在团队的见闻和感想写在笔记本上，为日后的创作准备素材。

长期的军人生活对库普林的思想有很大的消极影响，而这4年军官生活尤其明显。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的偏僻县城生活，粗暴野蛮的军官阶层、孤陋寡闻的当地知识分子，庸俗势利的小市民等使得这位未来的作家养成脱离政治、对革命运动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

库普林面临出路问题举棋不定：一方面他想成为一个作家，为此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中篇《在黑暗中》、短篇《月夜》等小说，甚至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悲哀和怨恨的人们》（未完成）。另一方面，他深知自己除了军事外没有别的专长，那末当一名高级军官也是好的。在一次县里举办的舞会上，他认识了某上尉的妻妹薇洛奇卡，这位长着栗色头发和蓝眼睛的姑娘使得库普林一见倾心，他写了不少诗向她求爱。薇洛奇卡也爱他，但是上尉对库普林说：“你那区区40个卢布1个月的薪俸将来怎能养活家小？如果要和我的妻妹结婚，你必须先进陆军大学深造一番才行。”

1893年8月库普林兴高彩烈地获准离开部队，奔赴彼得堡投考陆军大学。途经基辅时，他与几个同事玩了两天。这时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情：一次他们在第聂伯河畔的水上餐厅吃饭，刚坐下来，一个当地的警察局分所所长走过来一定要他们让开，因为这几个座位是警察局长早已定好了的。

军官库普林少年气盛，哪里听得进这话，一把将警察所长提将起来扔进河中。当满身污泥和青苔的所长爬上岸时，引起站在岸上围观人群的一片哄笑声。事后库普林继续北上应试，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是倒霉的事来了，他考了几门课程后，突然接到通知，被取消了报考的资格。原来基辅军区司令下了一道命令，鉴于库普林少尉在基辅“企图淹死正在执行任务的警官”，5年内不准他报考陆军大学，并命令他立即返回部队。库普林回部队缺少盘缠，在彼得堡举目无亲，告贷无门，只好变卖随身佩带的手枪。当他付清房租，坐上开往基辅的火车时，身上仅剩几个戈比了。事情就是这样急转直下，库普林从此只好与那个蓝眼睛的姑娘，与当高级军官的锦绣前程分道扬镳了。

从彼得堡回来后，他病了一场。1894年8月，他服役期满4年，几经犹豫，决定退役，成为一名后备役军官，结束了长达14年（1880—1894）的军旅生活。他说：“我抛弃了军职，现在是一只自由的小鸟了，我面前是自由广阔的天地。”

“我是一个流浪汉！”（1894—1901）

这8年是库普林深入生活和开始大量发表作品的时期，其中前3年当报刊记者，后4年到处流浪，不断变换职业，为后来成为俄国社会“生活的诗人”打好坚实的基础。

从牢笼中放出的小鸟要飞翔。库普林从兵营来到基辅街头想当作家，可是赤手空拳靠卖文为生，谈何容易！他说：

“我没有钱，也没有亲戚朋友，象一个斯棱斯克市贵族女子中学的学生突然来到奥洛涅茨的密林那样狼狈不堪，缺衣少

食，连个指南针也没有。”他向基辅的报刊杂志投稿，曾担任过《生活和艺术》杂志的记者，可是稿酬微薄，每行字还不到2戈比，无法维持生活，被迫流落街头，常常在公园或下等客栈里过夜。库普林是个有血性的男子汉，他感到生活上的贫困还能忍受，“最困难的是我缺乏任何知识，无论是科学知识或生活知识我都没有。”他决心投入生活的底层，从当“流浪汉”做起。他曾到莫斯科一家商店帮忙，那里“出售一些不便于说出口的家庭日常用品。”半年后库普林重新回到南方，奔走于基辅、日托米尔、敖德萨等地，观察当地人民的习俗，研究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人们”的心理，同时在基辅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报导、通讯（甚至写过“巴黎通讯”！）、小品文、法庭诉讼案件内幕，以及关于戏剧和文学作品的评论等。1895年他把这些散见于各报刊的文章汇成一本特写集《形形色色的基辅人》出版。1897年他的第一部作品选集《小型的彩画》问世。这两部书都是作家的习作，其中一些短篇后来经作者修改重新出版。从这些不成熟的作品中已经显露出库普林作为“生活诗人”的创作风格。库普林认为，记者和作家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作家是“生活的采访员”应该从大千世界中挑选素材，最好的办法是以记者的身份亲自从事各种职业，有了切身的体验后才能写出真实感人的东西。库普林的作品几乎都有真人实事做根据的。

每个作家要经过一段学习和探索时期，一般称为早期创作阶段。库普林的早期创作阶段是1889—1896年，即从他的《最新处女作》到《莫洛赫》发表为止。在这七八年间，他发表了40个短篇、两个中篇、14个特写以及一些新闻报导，其中一部分中、短篇小说收入选集《小型的彩画》。下面谈谈这些作品的大致情况。

库普林在青年时代受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他以“人们精神上罕见的、奇特表现的收集者”自居，写了一些病态心理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情节离奇古怪，主人公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听任摆布，此外，人的生理本能掩盖他的社会意识，具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短篇小说《在黑暗中》（1892）工程师阿拉林与某大资本家的家庭女教师齐娜依达相爱。阿拉林是个“多余人”类型的青年，不满庸俗无聊的生活，但又无法摆脱它。他在一次赌博中输了钱，挪用了一笔巨大的公款，面临受审或自杀的绝境。齐娜依达为了救他，答应委身于那个大资本家，把自己的卖身钱交给阿拉林。她想：“这种牺牲愈沉重，愈缺乏光彩和名声，愈值得去做”。但是阿拉林见利忘义，一面感激她的救命之恩，一面为了保持自己的好名声，不肯去坦白挪用公款的事。齐娜依达这时才看透了他：“您和大家一样……我讨厌您……离开我吧！”她受不了这个精神打击而死去，那个疯狂追求她的资本家因此服毒自杀，阿拉林也变得苍老了。《月夜》（1893）和《娜塔莉娅·达维多夫娜》（1896）宣扬人的兽性，表里不一，人心叵测，主人公既怕他人也怕自己，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阴暗面，谁也看不见的可怕的一面”。这个“可怕的一面”，从作品来看就是色情狂和虐待狂，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斯维德利加洛夫那样的淫欲。

《调查》（1894）是库普林第一篇描写兵营生活的小说。由于作者熟悉军队生活，作品不仅真实感人，而且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要虐待士兵？情节是这样的：鞑靼族士兵巴戈辛偷了同伴的皮靴筒和37戈比，少尉柯兹洛夫调查清楚后，本想将这个“穿着军大衣的孩子”教育一下就算了。不料上级知道后，次日组成战地法庭公审，判处